

87第4期

(总016期)



阳江文史



政协广东省阳江县委员会编

1987年12月

《阳江文史》1987年第4期(总016期)1987年 冬

目 录

民国期间阳江开建公路、马路概况.....	曾传荣(1)
何士德(续).....	陈立(9)
中国国民党阳江县党部历届	
机构和委员.....	鲁曾(21)
书年社和书年医院.....	史汀文(30)
姜自昭《创立书年社序》.....	(30)
附译文.....	(31)
梁庭楷《重订书年社章程序》.....	(32)
附译文.....	(33)
书年医院概况.....	(34)
美国教会与福民医院	
.....根据卫生局、罗鸿文未稿整理	(36)
双恩盐场历史概况.....	鲁华(38)
辛亥革命前夕阳江的一次起义.....	谭随时(40)
国民党军经阳江溃退时二三事.....	蔡德生(42)
阳江海陵大堤.....	石花(45)
牌坊.....	县文史办(49)
迁来阳江新洲定居的信宜人.....	雷永琳(52)
阳江方言探源(十一).....	许培栋(54)

民国期间阳江开建 公路、马路概况

曾传荣

一、阳江公路的建设

阳江公路的建设，开始于1926年(民国15年)。未建公路之前，阳江的交通运输，主要靠内河与海运两方面。内河方面，县城有墟渡定期沿漠阳江北上麻油。双捷、冈尾、阳春城、合水、春湾；西北入小水河经古良到达河口、潭水、三甲、双滘。县内有墟渡湖那近；到达北惯、合山、阳畔、那龙；北溯大八河到达塘坪、大八墟。民国15年后有电船直达春城。海运方面，近程有帆船和火船行走东平、闸坡、沙扒、电白及台山的斗山。远程的有两只拖渡(或单行)航行江门，24小时到达，每人收费5元。还有不定期的专船行走广州、澳门和香港。交通运输较便。

1926年(民国15年)3月，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在阳江召集南路各县县长开会，会上作出决议，各县要立即规划建设公路，安设电话，建筑中山公园，种中山林。

阳江公路建筑最早的是电城至儒洞(儒洞河西岸的河头)段，甘乃光召开会议时已建好路基见《中国农民》第四期《广东南路各县农民生活经济概况》。当年五月，开始筑江恩路(由东山寺开始)及江电路织等段。据广东省《党务月报》民国15年第八期刊载，县长陈鸿慈兼阳江县公路局长，“计划将公路局各职员由县署

职员兼任，将薪金为筑路之费”。不料织茅段刚筑好的部分路基，于7月间有“多处为飓风暴雨所冲”，又要待“聘省工程师及购备器材返江”，才得开工。

这时建筑公路“拟定两种办法：一、征工。凡壮年男妇，均要担任筑路，如不愿工作者，则缴纳免工费。二、认股。全县殷户照资产五份之一为度”，进行集股。拟征集数十万元作筑路经费。并公布筑路章程（见《党务月报》第十、十一期合刊，民国15年11月1日）。10月，陈鸿慈离职，陆嗣曾继任县长。此后建筑公路的费用，采用招股的办法，一元白银一股，分配到各区乡镇，个人亦可自愿认股，但多摊派到各公尝，由公尝出钱认股，由乡绅或管公尝者掌握股票。有的拟定招得五百股的任公路董事。从1930年起，先后分别成立江恩、江电、江陡（后改江台）和埠九等四条公路的董事会。这几条公路的董事，都是公路所经过的区乡绅士，他们都是较有实力或有名望的地方绅士。如江恩公路由三区绅士林浩川、李康符、林静予、梁理甫、钟期平、钟健生、林洁予、林开方等成立董事会，林浩川任董事长兼合山站长，后任江恩路站长，江台公路由二区绅士陈章袞、谭芝房、陈有融、陈奕祥、谭颂宜、杜百魁等组成江台公路董事会。埠九公路由四区绅士敖昌魁、林应芬、梁培忠、关国楨、陈炳蔚、梁熙年、梁开炎、敖和惠、梁光汉、梁起凤、区克文等倡议建筑，后组成董事会时，人员略有变动。董事长初为梁开炎，后为梁开晟。

自1926年5月，阳江县署规定征集沿公路附近壮年公民兴筑公路后，至1932年2月，江恩、江电、江台、埠九等路线先后筑成，购置汽车先后通车。江恩路由县城至合山段、江台路由县城至尖山河段及埠九路已于1930年通车。不久，尖山至大沟墟（后延至寿场渡头）、合山至那龙墟亦相继通车。1932年4月，寿场河北岸至新洲墟亦通车了。江电路由县城至儒洞墟全长82公里，亦在这年夏季全线通车。自1931年6月至1934

年3月，塘织路（织箕至塘口）、洋织路（织箕至上洋）、合田路（合山至田畔）、塘大路（塘围至大八）亦先后建成、陆续通车。

1935年秋还筑成大桐路，由织箕经至风景区大桐山。

这时的公路，都是官倡扶助的民办公路。1926年开始建设公路，县长陈鸿慈为节约开支，带头兼任局长，不领局长工薪。职员兼公路局职员亦不领工薪，以支持建筑公路。至1928年陈章褒任县长，亦兼公路局长，公路股票亦以公路局长名义签发。公路资金不足，设施简陋，购买旧汽车行驶。1935年采用李仲振改进的木炭炉汽车，以节约开支。江台路车站设于南门外农夫祠之东，江恩、江电路的车站分设于东门外，棚架结构，仅可容车。江恩公路合山河曾于1933年4月至7月建成一座钢筋混凝土桥，长200米，因桥身过低，不数年为洪水冲垮。江台路至尖山河、寿场河分段通车，没有设渡船，汽车不过河。江电路的鱿鱼头、落头均用木船接驳，比较方便。

为了加强公路的修建与管理，成立了四干公路董事会，会址设在水沟塘玉田祠。四干公路是江恩、江电、江台和江春四条公路。江春公路塘围至塘坪段于1934年8月才竣工，路程很短，尚无计划接通阳春，因属县道范围，所以纳入四干公路。四干公路董事会，由四条干线的董事会的代表组成。四干线所收建路的免工款和路租，交由四干公路董事会统一研究，维修四干公路的桥、梁涵洞等工程和有关事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寇飞机常骚扰轰炸城市和公路桥梁、渡船。次年，奉令破坏公路及桥梁，通过农田的公路除留下行人道外，都种上农作物，还分段挖掘坑穴，步行也很困难。日本投降后，江恩、江电两条省道陆续修复通车。而江台、埠九、洋织、塘织等公路直至建国后才修复通车。江春公路是在1950年修复塘坪、大八公路段时开始修建起来的。

阳江公路建设概况表

	公路名称	长 度	兴建年月	完成年月	备 考
省道	江恩路	44公里	1926年(民国15年)5月	1930年(民国19年)2月	合山桥1933年(民国22年)4月兴建,7月竣工,后为洪水冲垮。
省道	江电路	82公里	1926年(民国15年)5月	1932年(民国21年)1月	
县道	江台路	31.5公里	1927年(民国16年)5月	1932年(民国21年)2月	
乡道	埠九路	14.5公里	1928年(民国17年)10月	1930年(民国19年)4月	
乡道	塘织路	15公里	1931年(民国20年)1月	1931年(民国20年)6月	
乡道	洋织路	15公里	1932年(民国21年)8月	1933年(民国22年)8月	
乡道	合田路	11公里	1934年(民国23年)2月4日	同年3月1日	合山田畔由沿路附近公民建好路基,唯桥梁涵洞费用无着,尚未建筑,通车很迟。塘围至大八公路由沿路公民筑路基,桥梁涵洞尚未筑。
乡道	塘大路	20公里	1934年(民国23年)2月6日	同年3月10日	
乡道	大洞路	4.5公里	1935年(民国24年)5月	同年9月	

二、阳江县城马路兴建概况

阳江县城西滨漠阳江，水运交通方便，所以工商业区集中在十二街；十二街成了阳江工商区的泛称。所谓十二街，即津利街（群众旧称大闸，即今南恩路西端由割鸭巷口至太傅路口一段）、太傅街（群众亦称二闸）、三闸至七闸，一闸即一条街（太傅街至七闸相当于今太傅路），珠里街、渔洲街、大埠街（三街相当于今渔洲路）麒麟街（相当于今兴仁路）、龙津街（全街分四闸，相当于今龙津路由太傅路口至塘基头一段。）1926年（民国十五年）前，阳江战乱频繁，常受兵贼骚扰，商店居民每遭抢劫盗窃，因而各大街巷道首尾都设置闸门，有的闸顶可供更夫夜宿，不仅十二街的首尾都设闸门的木桥，而且各巷口和水巷也设闸门，如利登巷、豆腐巷、卖油巷、织蓬巷、黄屋巷、麦屋巷、金玉巷及其通往河堤的水巷都设闸，形成街街巷巷为营。平时晚上十时至次晨五时关闸，一经关闸，来往断绝。遇社会动乱时，提前关闸，推迟开闸，严重时全天关闸或仅于中午时开闸给居民挑水买米。各街道都雇用更夫守夜，更夫每于二三更击柝巡夜，漫声高呼：“关防夜盗，小心火烛”，提醒住户防火防盗。抱关击柝的情况，直至县城建马路时，拆除了街巷闸门，才没有了。

1929年（民国十八年）始拆城墙建筑马路。首先拆除西南面的城墙（由坝岸至医灵庙一段，逐步延长），用砖石建筑河堤路（注）。河堤路（由上濠渡头至下濠渡头）长475米，宽10.5米。用城墙的花岗石建筑沿岸长堤，用拆城的砖砌水渠。1929年夏初兴工，次年春节前建成。路面是用石灰、红泥、沙三合土夯成。

河堤路快完成时，1929年冬又开始拆建太傅路。太傅路长

345米，宽8.5米，路面用水泥沙石，质量很好，于1930年冬建成。太傅路开工数月后，开始拆东、西城楼，建筑南恩路。南恩路长1060米，宽与太傅路相同，1931年筑成。南恩路路面质量差，承包商曾被罚款，洮洲路长410米，于1930年3月兴工，当年10月竣工。兴仁路长247米，1931年7月兴建，次年冬竣工。龙津路长510米，于1932年11月兴工，1934年1月竣工。这几条马路都是宽8.5米，用水泥沙石筑路面。唯龙津路北段约250米因经费缺乏，以花砂碎石铺填。这几条马路还是用城墙砖石砌沟渠涵洞。

环城路以环北路兴筑最早，1929年开工，次年3月筑成，长540米；环城东路长710米，1932年8月兴工，8月竣工；环城西路长400米，1932年11月兴工，次年5月竣工；环城南路长882米，1934年7月兴筑，于1936年1月基本完成。这几条环城路宽都是9米，用花砂碎石铺填。

注：城墙高8米许，另地下基础米许，城墙底部约2米许，宽米许，全是花岗石条或板块，大小不一。花岗石上一层是巨型火砖墙，砖长约58公分，宽32.2公分，厚14公分，颜色有青灰色和朱红色两种；再上一层的火砖墙的砖较小些；这两层墙的高度各两米许，厚约50公分。再上是垛口，高米许，是清代重修，这部分青砖是民间常用的青砖，垛口以下，城内覆以泥土，底部宽5米，成斜坡形，以便士兵登城守望。因在城内挖土筑城墙，所以城环挖了池塘24口。

阳江县城马路建设概况表

马路名称	长度	路面 阔度	铺筑材料	兴 筑 年 月	完成年月
河堤路	480米	10.5米	石灰沙泥	1929年(民国18年)夏初	1930年2月
太傅路	351米	8.5米	水泥沙石	1929年(民国18年)冬	1930年冬
南恩路	1067米	8.5米	同上	1930年(民国19年)初	1931年
渔洲路	411米	8.5米	同上	1930年(民国19年)3月	同年10月
兴仁路	249米	8.5米	同上	1931年(民国20年)7月	1932年12月
龙津路	515米	8.5米	同上	1932年11月	1934年1月
环城北	546米	9米	花石	1929年	1930年3月
环城东	716米	9米	花石	1932年3月	同年8月
环城西	405米	9米	花石	1932年11月	1933年5月
环城南	885米	9米	花石	1934年7月	1936年1月

1929年(民国18年)姚之荣任县长时,拟定拆城筑马路计划,仿各市县开辟马路成例,向马路两旁商店、民居(以门口向马路者为准。)收缴骑楼地价,以补助筑路经费。各店缴纳数目,视马路地段兴盛程度而异。太傅路最高,渔洲路次之,河堤路、兴仁路、龙津路一段(亦叫蛋场街)又次之。如南恩路便分四等价:甲等,由西门外津利街(月城街)至马头一段,每井价银六十元;城内西门街至里仁闸段为乙等,每井价银五十元;由里仁闸至县政府前一段为丙等,每井价银四十元;由县政府至东门为丁等,每井价银二十元。

最先筑河堤路，因河堤需要筑堤岸，需款较多，除收骑楼价银外，还向内外大小船户按月抽捐：香港渡船每月抽银六元，江门、斗山轮船每月抽十元，大盐船、砖瓦船、大花艇每月抽叁元，中花艇、咸鱼船每月抽一元，墟渡船五角。此项船捐直至1931年李伯振任县长时才转呈建设厅核准撤销。

三、公路马路的建设，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公路的建成，促进了物资交流，使市场日趋兴盛。自1929年兴建马路，几年间，约有千间商店修建楼房，需要大批的建筑材料，农村增加了许多灰窑、砖瓦窑，县城增加大批建筑工人和运输人员。这时正是世界经济衰退，所谓不景气时期，而阳江这几年社会安定，大规模的公路、马路和城市建设，交通方便，信息灵通（自1928年安设电话，四五年间，各区镇和墟场都安设了电话，并远通恩平、电白、阳春）。却赢来市场繁荣。在城市建设方面，1932年秋，又辟旧游府衙故址为中山公园（面积约7836平方米），次年春完成。并从1933年3月起，江电路由县城至沙墟、江恩。江台附城公路和河堤路都分别种上大叶桉、细叶桉或马尾松，东西南北环城路分别种了银槐、洋紫荆、石栗或台湾相思，南恩路和青云路种凤凰或桄榔，绿化了城市。

何 士 德 (续)

陈 立

(四) 新四军军歌的诞生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有明确指示：新四军必须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但当时作为共产党员副军长的项英，受王明的投降主义思想影响，不积极执行中央指示，妨碍华中敌后地区党的工作的发展，并导致1941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重大损失。

叶挺同志为了组建新四军，不遗余力。1938年12月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新四军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江北部队的编制和全军的经费。那时周恩来同志已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但新四军内部由于项英不尊重叶挺，使叶挺感到内外交困，向中共中央几次提出过辞职要求，甚至只愿返江北，不愿回皖南。1939年5月初，叶挺根据东南局的指示到庐江组织了江北指挥部，由张方逸任指挥。为贯彻中央东进指示精神，做了组织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军长于1939年2月23日同到云岭军部。周恩来同志到云岭军部前后共20天，他同项英作了恳切的谈话，向他阐述了党的敌后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并商得他的同意，具体确定了新四军的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并肯定了陈毅同志等坚持东进，迅速向敌后发展的正确

主张。

周恩来同志三月上旬在军部，向排以上干部作了题为《新阶段的新关键》的报告。会后举行欢迎晚会，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主持晚会，并宣布也同时欢迎何士德等文化工作同志从南昌到军部。会上大家欢迎何士德唱歌，何站在桌上引吭高歌一曲《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歌声，激动着战士们的心。这时，陈毅同志也在座，于是在掌声中又请陈老总唱歌。陈毅同志用法语唱了《马赛曲》，“起来呀，法兰西子孙……”，战歌的激情，战士的激情凝聚在陈家祠堂。这个古老的建筑物，记下了历史的可贵的一夜。会后陈毅同志说，军队要有文化，要教战士唱歌，他讲了几个歌和战争有关的故事。他建议写支军歌，让全军唱起来。好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后来军部领导都让陈老总写歌词。他写下初稿，名为《十月》，又匆匆赶回率由根捏地去了。委托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等同志修改，后来和叶挺、项英等同志都议论过几次，也提了到意见，但未算改好，要等陈毅同志定稿。

五月，军歌歌词由冯定同志交到何士德手里。冯定对他说，军领导请你谱曲。何士德没有想到这个光荣任务会落到自己身上，因为他当时正在筹建军部文化队。听冯定同志的传达，他是又惊又喜；冯定同志说：“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一句陈老总很强调，所以重复几次，说是战略指导思想，是政治内容的核心。交给你，就看你的艺术表现手法啦。

何士德第一稿是采用民歌风格写出来的，他考虑到新四军战士多是南方农民，而红军中过去的歌曲亦多是民谣风。第一稿成后让文化队同志排练。组织试唱后，一致意见认为曲调流畅，动听，易上口；可总感觉到军歌不应该是这个味儿。认为新四军现在是同凶恶的日寇作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进行战斗，军歌首先应该是雄壮有力，使人唱了有胜利的信念，感到振奋，鼓舞斗志。何士德本来对军歌采取什么风格，是一下子拿不准的，他是倾向于沉雄的进行。

曲风格的，但又怕说是脱离农民出身的战士感情。现在听到了同志们的意见，何觉得很中肯，应拿定主意，放弃一稿。

军歌的二稿是据歌词的内涵感情，以庄严雄壮的行进节奏，体现新四军继承北伐铁军和红四军的光荣历史传统。以多种起伏的旋律分段体现出人民军队十年征战的光荣与自豪感；运用铜管乐的表现手法，顿挫有力地表现了党的军队“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的崇高目标”，把歌曲推向第一个高潮后，节奏跳跃跌宕不断前进最后高唱“东进，东进”，以富有推进力的一长一短旋律，运用向上推进手法续唱三次，一次比一次高昂、雄壮、有力。何士德以他所学到的音乐艺术充分表现了新四军这支队伍在党领导下的正确战略方向。

二稿在五月底完成再排练，正式试唱，听众比前增多，一致表示满意。第二天袁国平告诉何士德，军部领导正式通过了你的作曲。发出通知定名为《新四军军歌》，并在《抗敌报》上发表。之后又组织教唱，从各支队来军部学习的干部也请何到各驻地教唱《军歌》。指导员用《军歌》歌词教育战士，讲解我军历史、传统和作战方针。对部队政治教育是一个丰富的具体内容。

两个月后，陈毅同志因公回到军部，在军部大礼堂组织了一次盛大晚会演唱军歌。约有2000人参加，陈毅同志披着缴获的日军的黄呢子大衣入座，何士德指挥全体指战员高唱《新四军军歌》。整齐雄壮、精神振奋、情绪激昂，陈毅同志兴奋地站起来热烈鼓掌。陈老总招呼刚放下指挥棒的何士德坐到身旁，笑对何说：“你这个总指挥好啊……”。何士德向陈老总征求军歌各个方面的意见，陈毅同志说了些谦虚的话之后说：“我们有了一首雄壮的、能表现新四军特色的军歌了，很好！最后一句东进，东进……一次比一次高亢激昂的音乐处理，正表达了我军歌词所要强调的地方，你很有政治水平！”并多方鼓励何士德以音乐服务于战斗，他继续说：“在革命队伍里，唱歌的意义重大，要用歌曲教育战士，鼓

舞士气，指明方向，团结战斗”。他希望全军能很好地运用革命歌曲这个武器。

到1939年9月《八路军军歌》也出世了，从此我们的军歌伴随着队伍转战南北，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创作了军歌曲子后的何士德，进一步体会了音乐要结合战斗实践才有生命力的道理。陈老总的谆谆教导，使他更明确了革命运用歌曲作武器的任务。在新四军五年，他是把歌曲作为动员手段的，也是作为战斗的纪录。1939五次保卫繁昌的战斗，每次都和两三千名日军交战，证明我们新四军也能打大仗。何士德写了《繁昌之战》。从日军手中收复泾县县城，何写《哈哈，我们胜利了》。激战云岭，保卫军部，日军一万余人被我们在父子岭打得大败而逃，何写了《父子岭上》。鼓舞士气，执行向北发展方针，打通长江来往通路，赖少其同志写歌词《渡长江》，何士德将它谱了曲，显示新四军不是局守皖南，要在长江两岸来去自由，唱出“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的来去”的意愿。全年战士都十分喜爱这支歌，皖南事变后，被关进上饶集中营的战士还常常高唱着它，互相鼓励，加强斗志。为了配合部队进行阶级教育、政治课的需要，何士德还写了《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青年之歌》、《战地的妇女》、《优待抗属歌》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不存在了，何士德在新军部盐城华中鲁艺写了《新四军万岁！》、《当兵把仇报》等歌曲，回击国民党的谰言。记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显示了人民军队的斗志。

何士德在新四军中作为军部文化队长，实践着陈毅同志好好运用革命歌曲这个武器的指示，努力于音乐艺术创作。他还和吴薈合作写了四幕歌剧《反正》。组织大型演唱《收获》，丰富了部队文化生活。

革命的实践是革命文艺创作的源泉，这句话不假。何士德同志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战争的生活实践。他率领军部战地服务团，夜渡

青弋江，赶上先出发的叶挺军长，参加了泾县战斗，胜利地从日寇铁蹄下收复了泾县。他参加了傅秋涛将军指挥的保卫军部的父子岭战斗，打退了日寇步、炮、骑、空配合下的四个联队的进攻，歼敌千余人。战斗结束，何士德和战友们共享胜利的欢乐，唱出“我们站在父子岭上，歌颂这胜利的战场……”。他带领战地服务团，几次渡江去江北执行任务，何士德说我们虽艰苦，但每次渡江都增强了来去自由，敌人无奈我何的信心，亲身体会到敌后去的有利因素。何士德认为在歌声和火药味分不开的岁月，是愉快的岁月，也是他音乐创作造诣上成就最大的岁月。

1939年12月，何士德带领军部战地服务团100余人到苏北根据地去向陈毅同志报到。那时候，由于陈毅同志最积极执行东进指示，11月7日有名的黄桥决战胜利，有力打击了韩德勤顽军，教育了苏北广大人民，只有团结抗日才是民族出路；制造磨擦，以各种借口来束缚新四军手脚，阴谋反共，注定要失败和灭亡的。苏北开辟了大片根据地，这时江北指挥部也改为苏北指挥部，军部即组织先遣队去苏北，何士德的战地服务团就是先遣队的先头部队。何士德将服务团交给了政治部主任钟其光。就于2月8日到华中鲁艺分院去任音乐系主任。华中鲁艺分院是新四军军部的直属单位。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25日重建新四军军部于苏北盐城，鲁艺分院正式编制为军部机关，由刘少奇（胡服）任院长，教导主任邱东平、黄源。和何士德合作很好的萧波任实验剧团团长。

新四军军部接受中央命令在苏北组建后，日敌即进行大扫荡，从6月开始，连续向我军进攻，企图扼杀新军部。反扫荡战斗持续一个月零二天。

在战云密布的情况下，6月22日鲁艺撤出盐城，驻在湖垛镇，各系分到村庄去进行宣传，配合地方党组织动员参军，《当兵把仇报》的歌曲就是这时写的。陈毅同志号召大家学会游泳，因为那

里是河网地带，何士德小孩时候就懂游泳，他又变成游泳教员了。

7月23日早晨，何士德回湖垛院部，见到曹获秋和地委的同志刘冰等在开会，看样子很紧张，邱东平来了，拉住何士德说，敌人已进了盐城，参谋部命我们把400多学员带去湖垛南方隐蔽。言犹未了，王源、孟波和美术系主任莫璜也来了商量一下，何士德提出不应往南走，应往北走，南方是水网，我们的人多不熟水性，往北是丘陵地多，又靠近黄克诚部。这时参谋还未走，何就请参谋将意见回去汇报。但邱东平、孟波还是坚持执行参谋部意见往南走，结果，何士德率200多学员和副教导主任王源、莫璜等往北走。不到中午消息传来，往南的队伍和敌人遭遇，队伍散乱了。何士德即提出分兵两路，请王源同志带大部分人继续向北推进！何挑选20多名精干的经过战斗的学员留原地接应收容南去散失的同志。不久，南去的学员40多人往北跑回来了，何士德把他们收容下来，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中。这次往南走的学员牺牲20多人，失踪50多人。几天之后，何等又带领这支收容回来的队伍去找军部，一路向北走。有消息说军部在阜宁，要折向东走，何士德分析说，军部决不会去阜宁，阜宁在大河边，有利鬼子汽艇活动，陈老总才不会这么个傻瓜！何决定继续向西北走，从东沟过河才走出三里地，阜宁方向打起来了，后来他们在旧黄河边找到了军部。在战斗生活中的何士德表现得十分机敏，和艺术追求一样，何同样是勇敢的。

找到了军部，参谋部的同志很佩服何士德的勇敢、机智，并且详细听了何的走北不走南的根据。陈毅同志笑着走过来说，老何是对的，是文化人嘛！你们变成能文能武了。热情地询问他最近创作情况，见何士德的鞋子破了，特地送他一双新鞋，还笑着说广东人赤脚也能走路的，但打仗还是穿鞋子好。

由于要适应战争环境，8月20日军部决定将鲁迅艺术学院分为两个工作团。一个属军部政治部叫军鲁艺工作团，何士德任团

长，一个属黄克诚的师部，叫师鲁艺工作团，孟波任团长。何团侧重音乐，孟团侧重戏剧。

1942年初，贺绿汀同志也到何士德这个工作团来了。军部指示，应给贺一些较好的创作条件。何士德给他配备了马匹和独间的住房，让他安心创作。同年9月，贺的问世之作《新世纪的前奏》写出来了。

1942年5月，陈毅同志的意见让一班文化人安心创作，成立文化村。何士德、孟波、贺绿汀等都在该处，并配了一位管军事的副团长，使何士德有较多的时间创作。何在这段期间写成了《指挥法》、《发声法》，发表在军音乐工作团刊《新音乐》上。何还在此时分批训练了连队文化教员，为军队的基层文化工作打基础。

（五）从延安到东北

1942年12月何士德和孟波、邵惟等奉调到延安鲁艺工作，他们取道山东，走了十个月，才到达延安。何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当戏剧、音乐训练班的主任，培训部队文化工作者，当时，还负责组织排练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何士德参加了延安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学纺线，背煤，开荒生产。

1945年4月，何士德当选为党七大候补代表，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七大”开幕式上，他指挥全体代表唱《国际歌》。何士德，光荣啊！

这时，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8月苏联对日本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东北，向关东军进攻，日军崩溃已成定局。毛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争取在东北完成党“七大”提出的任务。苏对日宣战后，